

前嘉靖本时代《三国演义》版本探考

张宗伟

1929年，郑振铎先生提出：嘉靖本是《三国演义》刊行最早的版本，别本都从嘉靖本所出，诸本之间只有表面差异并无原则区分。^①此说一出，遂为中国大陆多数治《三国》版本的学者认同。当时除了毛宗岗父子评本以外，学界无法见到更多嘉靖本以外的版本，因而没有理由不相信郑氏所言，于是国内学者把《三国》版本研究的重点集中于毛本和嘉靖本的比较上，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从总体来看，只研究现存刊行年代最早的嘉靖本和最流行的毛本是远远不够的，30年代以来至今，人们陆续又发现并积累了许多新的《三国》版本资料，不研究这些新的版本，就无从探求《三国》原稿的真实面貌，无法弄清《三国》版本的演化情况，从而也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三国演义》版本研究。

本世纪七八十年代，海外学者如柳存仁、小川环树等人借助新的版本资料，向郑振铎先生的传统看法发起挑战。柳存仁认为闽刊本虽然比嘉靖本晚出，但它们比嘉靖本更接近罗贯中原稿的面貌，其所据底本比嘉靖本要早。小川环树则指出了闽本与嘉靖本存在内容上的重大出入，即闽本有嘉靖本所无的详细的关索故事，从而说明闽本并非嘉靖本的简单翻版。柳存仁和小川环树的研究是开创性的，启发了后来的马兰安、上田望、金文京、中川谕等海外学者循此线索作进一步的研究，并不断有新的发现，他

们研究的最新成果汇集在周兆新先生主编的《三国演义丛考》一书中。^②不过正如英国学者魏安所说，上述学者的研究比较深入，但并没有完全弄清《三国》的演化和版本问题，“仍存在很大的商榷余地”，所以魏安全面查考了二十多种不同的《三国》版本，并运用比较各本串句脱文的办法来给现存版本进行归类，于1996年出版了考证《三国》版本问题的专著。^③魏著考察的《三国》版本最多，其归类也比较科学，但遗憾的是，它对小说原稿的面貌，对嘉靖本问世以前《三国演义》流传情况的探讨还很不够，本文即旨在弥补这一缺憾。

笔者认为，今存《三国》的最早刻本是嘉靖元年（1522）序刊本，但是嘉靖本的底本不一定是《三国》的原始祖本，在嘉靖本问世之前（姑称之为前嘉靖本时代），《三国》已经历了多年的传抄刊刻，嘉靖本的底本只是辗转传抄过很长时间的系列抄本之一。尽管这些早于嘉靖本的版本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也能够通过手头掌握的资料大致推求前嘉靖本时代《三国》版本的流变概况。

—

《三国演义》大致写定于元末明初，此时距嘉靖壬午年（1522）《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刊行尚有二百年左右的时间。于是有人提出质疑：《三国》是我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如果它是写定于元末明初的话，在当时没有成熟的理论指导和成功小说作品可资借鉴的情况下，罗贯中如何能创作出《三国》这样不朽的作品来？如果说《演义》写定于元末明初，又为何直到二百年后的嘉靖元年（1522）才出现了它的最早刻本？在嘉靖元年以前的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没有一种《三国》的版本保留下来，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是否真有二百年的一段空白？

上述疑问实属多虑。元末明初能否产生《三国演义》这样的

不朽之作？这本来是文学史家早就作出肯定回答的问题。诚然，《演义》问世以前，中国文学史上确实还没有过像它那样的长篇小说，但是时代的发展、文学自身的进化再加上罗贯中个人的天才，使《三国演义》的产生已经成了历史的必然。大量的史书、丰富的民间传说、多彩的民间文艺都是罗贯中可以吸取的营养。这样的营养养育出的必然是《三国演义》这样的历史演义小说，在罗贯中的时代产生不了《金瓶梅》和《红楼梦》，他只能创作出《三国演义》。或许正是因为通俗历史演义这种形式，才有人怀疑或贬低罗贯中在创作《演义》过程中的独创性贡献。

至于从元末明初到嘉靖元年这二百来年间，也就是从《三国演义》写定到嘉靖本问世之间的二百年，中国小说一直在按自身的规律发展，当然不会有所谓二百年的空白。我在下文将要证明，《三国演义》在此期间不是没有流传，相反这二百年恰恰是《三国演义》版本流传非常活跃的一个时期，《三国演义》的流传说明这二百来年是中国小说史上看似单薄实则是潜流暗涌的时期。下面我们就对这一时期《三国》版本的流传作一些探求。

嘉靖本庸愚子《序》云：“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明确指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该序还说罗氏原稿成书以后曾被士君子“争相誉录”，可知嘉靖本付梓之前一定抄本甚夥，嘉靖本修髯子《引》说：“简帙浩瀚，善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因为抄本甚多，而且传抄的时间很长，刊行嘉靖本的人要找到“善本”的确是很困难的，梓行者必须对所选底本进行一番校勘才能付刻，不过其显然校勘不精，因为嘉靖本中出现了很多串句脱文。所谓“串句脱文”，亦即我国传统学者所谓的“因同字而脱（衍）”，是指在一段文字之内经常会出现两个相同或相近的词（词组），在版本传抄刊刻的过程中，抄手（刻手）往往在抄刻到两个相同（相近）词组

中的第一个词（词组）的时候，跳过接下去的内容，而从相同词组中的第二个词组继续往下抄刻，这样就会漏掉两个相同词（词组）中间的文字和其中的一个词（词组）^④。英国学者魏安首次大量采用串句脱文（homoeoteleuton）的方法来探求版本之间的关系^⑤。我觉得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也将利用串句脱文的方法来作为确定版本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

如果一个版本有大量的串句脱文，起码可以说明该版本距离祖本较远；如果某几个版本有许多共同的串句脱文，那么这几个版本很可能有共同的祖本；如果版本一在某处有串句脱文，而版本二在该处不脱文，那么版本二不会出于版本一。比如我们随手可以举出两个嘉靖本有串句脱文而别的版本都不脱文的例子：

例 第42则《关云长袭斩车胄》【回目文字从嘉靖本，下同，不再注明。】

脱文 却说玄德知袁术已丧，写表申朝，书呈曹操。令朱灵、路昭回许都见曹操，说玄德留下军马。嘉5：14【前面的数字为卷数，后面的数字为页码，下同】

不脱文 却说玄德知袁术已丧，写表申朝，书呈曹操。令朱灵、路昭回许都，留下军马保守徐州。玄德见一路人民流散，随处招谕复业来还徐州。朱灵、路昭回许都见曹操，说玄德留下军马。周3：9；夏3：8；李21：10；叶2：72；杨4：17；蔡4：12

例 第186则《孔明祈山破曹真》

脱文 故令汝二人前去，过山脚后路，远下营寨。汝看火起为号，却分兵于两下。嘉19：47

不脱文 吾故令汝二人引兵前去，过山脚后路，远下营寨，任魏兵来劫吾寨。汝看火起为号，却分兵于两下。周10：28—29；李93：10—11；叶8：67；杨16：18；乔16：13；蔡16：14

在上面的例子中，今存明刊本《三国演义》只有嘉靖本缺漏了其他版本中划线的两个相同（相近）词组中间的内容和其中一个相同的词组，而别的明刊本都保留嘉靖本缺漏的这些部分，很显然是嘉靖本所据底本的抄写者在抄完第一次划线的词组后，看漏了下面的内容，接着就从第二次划线的相同词组继续往后抄。嘉靖本出现这么多串句脱文的情况，证明它在付梓前必然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传抄；今存比嘉靖本晚出的所有明刊本在嘉靖本脱文的这些地方都不脱文，又说明它们不都直接出自嘉靖本，其中一些明刊本的底本可能出自另外的抄本系统。由此可见，今存所有明刊本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的说法是不对的。

尽管嘉靖本刊印的时间比现存诸本都早，但它的底本只是由罗贯中原稿演变出来的系列分支的一种，并不一定最接近罗氏原稿；嘉靖本刊行时又经过了蒋大器、张尚德等人对其所据底本的修订，那就离罗氏原稿更远了。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大胆推论：从罗氏原稿（原祖本）写定到嘉靖本梓行的近二百年间，《演义》基本上以抄本的形式流传，在长期的传抄过程中，《演义》的抄本演化成为不同的系统。其中最重要的抄本系统有两个：一是主要在士大夫和文人阶层中流传的嘉靖本的底本，一是传入福建、后来被建阳书坊主争相翻新以满足市民阶层需要的闽刊本的祖本。这两种抄本系统经过长期的演化，到明中叶出现了各自的代表版本——嘉靖本（1522年）和叶逢春本（1548年）。

嘉靖本和叶逢春本是现存刊行年代最早的两种版本，它们也是前嘉靖本时代《三国演义》最重要的两种抄本系统的早期产物。比较这两种版本的异同不仅可以推求罗贯中原本的面貌，而且能够大体勾画出嘉靖本问世以前《三国》版本的演变情况。嘉靖本和叶逢春本的差异首先体现在形式方面。

回目 嘉靖本的段（则、节）目是统一的七言句，应是经过

不断整理加工的结果；而叶逢春本的段目长短不一，每段字数五、六、七、八言不等，如“孔明哭周瑜”（五言）；“曹操谋杀董卓”（六言）；“祭天地桃园结义”（七言）；“安喜县张飞鞭督邮”（八言），其中以七言句最多。与嘉靖本的段目相比，叶逢春本的段目更多呈现的是《演义》草创时期的面貌。

分卷 虽然嘉靖本和叶逢春本都是二百四十则，但嘉靖本分为二十四卷，而叶逢春本分为十卷。现存所有明刊本中只有叶逢春本分为十卷，很可能罗贯中原稿就分为十卷，嘉靖本刊行时经过了一番整理，改分为二十四卷。二者的分则也有差异。比如第33则《袁术七路下徐州》与第34则《曹操会兵击袁术》两则嘉靖本和叶逢春本分则的位置就各不相同。

年代记录 叶逢春本每卷前记录本卷事实的年代起讫，与嘉靖本关系很近的夏振宇本、周曰校本各卷也有年代记录，因为夏、周两本与叶逢春本的分卷不同，所以它们每卷的年代起讫与叶逢春本不同；另外，周、夏二本各卷的年代记录均放在卷末，与叶逢春本把年代记录放在卷首也不相同。嘉靖本各卷首末均没有本卷起讫的年代记录。我认为罗贯中原稿应该与叶逢春本一样每卷有年代记录，嘉靖本的刊行者改动了罗氏原稿的分卷位置，罗氏原稿中每卷的年代起讫不再适应嘉靖本新的分卷情况，因此罗氏原稿中的年代记录便被嘉靖本弃之不用了。

总歌 叶逢春本卷一首有三十二句的一首总歌云：

一从混沌分天地，清浊剖闢阴阳气。
开天立教治乾坤，伏羲神农与黄帝。
少昊颛顼及高辛，唐尧虞舜相传继。
夏禹治水定中华，殷汤去桀行仁义。

.....

.....

和觞安顺幸清平，冲质两朝皆早逝。
汉家气数致桓灵，炎炎红日将西坠。

献帝迁都社稷危，鼎足初分天地碎。

曹刘孙号魏蜀吴，万古流传三国志。

这首总歌从开天辟地写起，终于三国鼎立，将先秦、秦、汉历史尽皆囊括于诗中，既是历史的回顾，也有作者对历史的评价，显然作者非常熟悉历史，诗本身写得也有一定水平，不像是刊行叶逢春本的书坊主所写，倒极有可能是叶本保留的罗贯中《演义》原稿的内容，也就是说这首长篇咏史诗系罗贯中自己所作。下面的分析证实了我的这种看法。嘉靖本修髯子《引》云：“余不揣谫劣，原作者之意，缀俚语四十韵于卷端，庶几歌咏而有所得欤”，其“俚语”（共六十四句）云：

今古兴亡数本天，就中人事亦堪怜。

欲知三国苍生苦，请听通俗演义篇。

.....

.....

天假数年寿孔明，山河未必轻归晋。

此编非只口耳资，万古纲常期复振。

修髯子《引》明言其“原作者之意”写了总结三国历史的七言诗，诗中所咏朝代和时间上接汉末，与叶本咏史诗刚好衔接。可见嘉靖本依据的底本上应该有罗贯中所写的咏前三国历史的长篇诗歌，庸愚子在刊行嘉靖本的时候删掉了罗氏原诗，而代之以自己所作的咏三国历史的“俚语四十韵”，罗氏原诗反不见于嘉靖本。但叶逢春本卷一首恰恰保留了罗氏原稿中总结三国以前中国历史的七言诗三十二句（这首诗也出现在后来的多数闽刻本中，名为《全汉总歌》）。

人物表 嘉靖本有《三国志宗僚》，按蜀魏吴的先后顺序一一罗列三国人物；而叶逢春本的《三国君臣姓氏附录》则不列君臣的具体名号，只有一个纲目，按魏蜀吴的先后顺序依次为“帝纪”、“后妃纪”、“臣纪”、“皇族纪”、“别传”（附传）。紧接《姓氏附录》之后有一长一短两首题为“静轩先生”所写的七言咏史

诗，长者二十句，短者只有四句。

二

虽然嘉靖本和叶逢春本的故事情节基本相同，都没有任何关于（花）关索的故事，^⑥但是二者在内容上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差异透露出前嘉靖本时代《演义》版本演化的信息。

第一、关于周静轩诗和其他诗作。

叶逢春本在《姓氏附录》后已出现两首“静轩诗”，此外，叶逢春本现存八卷中总共还有静轩诗四十四首，其中有两、三首题为“周静轩”所写。周静轩是明中叶余杭人周礼。明末建阳书坊刻的《增广事类氏族大全》中《皇明人文》卷十八《隐居静轩》条，有他的小传，嘉庆十三年（1808）《余杭县志》亦有关于周静轩的记载。刘修业先生曾说周静轩大约生活在第十五世纪的下半世纪和第十六世纪的上半世纪。^⑦刘先生的推断十分正确。叶逢春本是今存最早的闽刻本，叶本中出现了这么多的“周静轩诗”，这表明：起码在叶逢春本刊行的十六世纪中叶，“周静轩诗”已被建阳书坊主大量采用。

叶逢春本的所有周静轩诗都不见于嘉靖本，也就是说叶本中所有静轩诗都是叶逢春本的梓行者增入的，但在后来的某些闽刊本中，许多题为周静轩所写的咏史诗也为嘉靖本所有，不过不题“静轩诗”而已。看来，郑振铎先生的考察并没有错，所谓周静轩的诗，应是嘉靖以后孱入的，或许叶逢春父子就是把周静轩诗孱入《三国演义》始作俑者，尔后被建阳书坊主仿效。

第二、关于《论》《赞》《评》。

引用史书的评论是历史演义小说的一大特点，《三国演义》现存所有版本中都有大量引自《三国志》等史书的《论》、《赞》、《评》。总体而言，这些版本中《论》、《赞》、《评》的来源不同，数目不一，文辞也稍有差异，但是有一批《论》、《赞》、《评》是各

本完全相同的，即六条陈寿《评》（第156、169、181、207、212则）；两条裴松之《论》（第53、84则）；两条习凿齿《论》（第81、202则）；五首杨戏《赞》（第168、169、183、207则）。这些《论》、《赞》、《评》是嘉靖本和叶逢春本共有的，因而也极有可能是罗贯中原作中就有的。

见于嘉靖本而不见于叶逢春本的《论》、《赞》、《评》

共有二十七条^⑧见于嘉靖本而不见于叶逢春本的《论》、《赞》、《评》是罗氏原稿没有的，它们都不直接引自《三国志》和《后汉书》，而是由嘉靖本的传抄刊刻者引自《十七史详节》。^⑨理由是：第一，嘉靖本第17则中关于董卓的《论》、《赞》后有一条小字注云：“已（以）上见于详节”，直接透露了嘉靖本的部分《论》、《赞》、《评》来自《十七史详节》。第二，通过仔细分析，我们发现，上述二十七条《论》、《赞》、《评》的体例与文辞都从《详节》而不从《三国志》和《后汉书》。可见它们是在罗贯中写定《演义》之后，在嘉靖本的传抄或刊行过程中由人根据《详节》硬插进去的。

一条尹直《赞》

嘉靖本第207则《孔明秋风五丈原》中有一条题为尹直所写的诸葛亮《赞》为叶逢春本所无。尹直（1428—1511），《明史》有传，说他是景泰五年（1545）进士，正德中卒，著有《名相赞》。上引诸葛亮《赞》即见《名相赞》卷二《丞相武侯诸葛公孔明》条。《名相赞》有弘治十七年甲子（1504）春二月自序，比嘉靖元年（1522）早。因为这篇《赞》不见于叶逢春等闽刻本，它很可能是在嘉靖本的祖本里增入的，并不见于罗贯中的原本。

总之，上述这些见于嘉靖本而不见于叶逢春本的《论》、《赞》、《评》都是在嘉靖本抄本系统的传抄过程中逐步增插进来的，它们并不见于罗贯中的原稿。

第三、关于小字注。

嘉靖本和叶逢春本都有双行小字注，但是两本小字注的数量

悬殊很大。据初步统计，嘉靖本共有四百余条小字注，叶逢春本今存八卷中只有三十余条小字注，其数量不及嘉靖本小字注的十分之一。罗氏原稿成书以后，辗转传抄过很长的历史，不同抄本的传抄者和不同刻本的刊行者都可能对小字注进行增删改易，所以原稿中小字注的面貌已经不可能探讨了。既然《三国演义》小字注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那么根据小字注的情况尤其是只依据嘉靖本小字注的情况去推求《演义》的成书年代，显然是很不可靠的。

嘉靖本大量音注系后人所加。嘉靖本共有一百多条音释小字注，占嘉靖本全部小字注三成以上，这些音释小字注基本采用“直音法”注音，即用习见的常用字去训生僻的难字，比如“揲蓍”注为“音舌尸”，“谗阅”的“阅”注为“音隙”等等。如果这些注音是作者一人所加，按理前后应该比较一致，但是不然，有几处地方同一字却用了不同的字作注。像“妆奁”的“奁”字在卷二之六和卷四之七分别注为“音连”和“音廉”，“揲蓍”的“蓍”在卷八之四和卷十六之二分别注为“音尸”和“音诗”。因此有理由假定这些音注出自不同人之手。

叶逢春本仅有两例音注，^⑩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三国演义》的祖本中没有注音小字注，因为如果罗贯中的《演义》原稿中就有大量音释小字注的话，叶逢春本应该不会只保存两例，我猜测叶本的这两个注音小字注或许是其底本的传抄者加上去的。

嘉靖本地名注系杂抄旧籍而来。嘉靖本的地名注同音注一样，完全没有统一的体例。更有同一地名几次加注却前后不一的情况。比如：卷十三提到“绵竹”，后注云：“今县名”，但卷二十四再次提到“绵竹”时，却注为：“今雒城”，若是作者一人加注，既然前文已注明绵竹是“今县名”，为何过了不久就成了需要重新加注的非“今地名”了？更令人生疑的是同卷提到雒城，却又注云：“今涪城”（而且卷十三出现“雒城”时，并没有加注；只在“雒

县”后注云：古县名，今之江州也），看来“雒城”又成了非“今地名”，我们不禁要问：到底绵竹、雒城（雒县？）与涪城三者是否是一个地方，若是，哪一个是“今地名”？

但如果说嘉靖本的地名注是在小说传抄过程中和刊刻时由不同的人杂采旧籍时插入的，那么地名注混杂不清的原因就迎刃而解了。我们知道，不同的地理和历史旧籍给三国时的地名加注时是不一样的，而传抄者只知杂采旧籍，搬录前人旧注，故而汉唐宋元旧籍中之“今时某地”全成了嘉靖本中的“今时某地”小字注。比如卷二十“陆逊石亭破曹休”，于皖城后注云：今之浔阳也；卷六“曹操官渡战袁绍”提到官渡，后注云：官渡在郑州中牟县北，二者都反映唐代的地理情况，其中“官渡”注是抄袭《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其他如卷九“夏口”注为“今时鄂县”、卷十一“武陵郡”注为“今属鼎州”、卷十一“桂阳郡”注为“今属郴州”等都跟南宋郭居仁《蜀鉴》之地名注基本相同。

叶逢春本只有寥寥几个地名注，而且注释极为简略，只注为“地名”、“县名”，所谓“今地名”注在叶本中更是屈指可数，只有“武陵”后注“今属鼎州”；“长沙”后注“今属潭州”；“零陵”后注“今属永州^①（《诸葛亮傍略四郡》）”；“皖城”后注“今之浔阳是也”（《陆逊石亭破曹休》）；“柴桑郡”后注云：“今是江州。”（《孔明遗计救刘琦》）等几条。所谓证明小说成书年代的嘉靖本中那些“今属××路”的小字注在叶逢春本中一条也没有，试想，如果是罗贯中自己写了这些透露成书年代的地名小字注，那为何后出的叶逢春本却一条都没有保留？难道叶本会单单刊落那些“今属××路”的小字注吗？显然不是。惟一合理的解释是嘉靖本杂抄旧籍插入了那些符合几个朝代地理情况的今地名小字注。

《详节》论、赞、评本身附带的小字注非罗氏原稿所有。在叶逢春本中找不到嘉靖本中那些引自《详节》的《论》、《赞》、

《评》，当然更别说有《论》、《赞》、《评》附带的小字注了，这也说明罗氏原稿没有采用《详节》的《论》、《赞》、《评》及其小字注，因为如果罗氏原稿就有，那么总会在叶本中保留一二的，叶本不会单单删掉来自《详节》的《论》、《赞》、《评》。

据初步统计，嘉靖本中来自《详节》的《论》、《赞》、《评》本身附带的小字注共有二十条左右，分别见于第5、17、18、41、79、122等则之中，比如第18则《李傕郭汜寇长安》写王允被杀所引之《赞》两条就直接引自《详节》。

嘉靖本还有五条小字注是引自王幼学（1254—1346）所著《资治通鉴纲目集览》，罗贯中有可能参考《集览》并引用其中的注释，但是这五条小注只见于嘉靖本而不见于叶逢春本等闽刊本，说明了它们不是罗氏所引，因为闽刊本保留了嘉靖本别的许多小字注，不可能仅仅删掉引自《集览》的这几条注释，所以这五条注释应该是嘉靖本的刊刻者所加。

综上，嘉靖本中诗文及《论》、《赞》、《评》中的小字注是传抄者和刊行者增插《十七史详节》等史书时附带加入的，另有少数小字注则系他们采自《资治通鉴纲目集览》等史书，它们均不见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原稿。嘉靖本改罗氏原稿正文内容所成的小字注中，没有一条是能够证明《演义》成书年代的所谓“今地名”注，因此不能仅据嘉靖本中的小字注尤其是地名注去探求小说的成书年代。嘉靖本的小字注只是透露了嘉靖本传抄和刊行的某些情况而已。

第四、关于细节描写

糜夫人之死。第82则《长坂坡赵云救主》写糜夫人之死，嘉靖本与叶逢春本不尽相同。在嘉靖本中糜夫人投井而死：“赵云三回五次请夫人上马，夫人不肯上马。四边喊声又起。云大喝曰：‘如此不听吾言。后军来也！’糜氏听得，弃阿斗于地上，投枯井而死。赵云恐曹军盗尸，推土墙而掩之（后有小字注云：后来子

龙不得入武臣庙，与子胥把门。盖因吓喝主母以至丧命，亦是不忠也）。……赵云推土墙而掩之。”在叶逢春本中，糜夫人是触墙而死：“赵云三回五次请。夫人不肯上马。四面喊声大举。云大喝曰：‘如此不听吾言。’糜氏弃阿斗于地下，遂将头撞墙而死。后来子龙不得入太庙，与伍子胥把门。盖因喝主母以至丧命，亦是不忠。……赵云就推土墙而掩之。”

罗贯中原稿中糜氏究竟是投井而死还是触墙而死，今天已经很难探讨了。《三国志》有糜夫人的记载，但史书没有交代糜夫人之死的细节。《三国志平话》中身死墙下的是甘夫人，也没有写明甘夫人是如何死的。我倾向于认为叶逢春本的描写比较接近罗氏原作。因为《平话》写的是“于墙下身死”，根本没提到投井一事，嘉靖本的梓行者或许认为撞墙而死过于残酷，因而改作投井而死，并加上“赵云恐曹军盗尸，推土墙掩之”，但紧接下文又有“赵云就推土墙掩之”一句，明显重复，这是嘉靖本修改原作不慎留下的痕迹。而且嘉靖本把评论赵云不忠一句（叶逢春本划线部分）改成了小字注。这条小字注的内容同时出现在叶逢春本和嘉靖本中，极有可能罗氏原作中就有此评论。

伍伯的故事。第147则《庞德抬榱战关公》和第148则《关云长水淹七军》两则中，叶逢春本有十余处写到庞德有一员“骁将伍伯”，随庞德战死的情节。先看叶逢春本关于庞德出征的描写：

德把盏毕，……手下骁将伍伯问曰：“将军载榱何意？”
……伍伯曰：“将军万一有失，吾亦舍头与将军报仇。” 卷7，11—12

而嘉靖本中相关段落中“伍伯”作“五百人”或“五百将”，“汝”作“汝等”，“伍伯”一个人一下变成了五百个人，这样一来，嘉靖本下文的描写就显得十分不合情理。本来经过几番激战，庞德手下的“五百人尚无百十”，后又被射死大半，按说最多也就剩下三五十人了，但请看嘉靖本下面这段叙述：

众军皆降，止有庞德一人力战。正遇荆州数百军驾小舟近堤来捉庞德。德提短刀，飞身一跃，上小舡，立杀数人。被降军五百人皆上舡，忙使短棹，欲奔樊城来，上流头一将撑一大舡而至，将小舡撞翻。庞德并军士尽落于水中。舡上那员将跳入水中，生擒庞德上舡。军士沉水而死。

所剩无几的五百人居然又全部复生，且一齐挤上一只小船，实在是不可思议。但叶逢春本作伍伯一个人与庞德一齐战死，完全符合情理：

众军皆降，止有庞德与伍伯二人力战。……伍伯拖弓矢下船，二人乘驾小舟欲拔（投）樊城，忽上流头一将驱大筏而来，当头一冲，把小船冲翻。庞德伍伯堕于水中，筏上将跳下水，生擒庞德上筏。伍伯甲重，沉于水底而亡。 卷7，15—16

通过上文的比较可以看出，叶逢春本的描写优于嘉靖本，嘉靖本之所以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是因为在它这个抄本系统的传抄过程中，有人不知道伍伯的意思，故自作主张改成五百人，其实“伍伯”是三国时期很常见的一种低级官职或下级军官，史书中也屡屡提到这个官名，比如陈寿《三国志·庞德传》云：“德与麾下将一人伍伯，二人弯弓傅矢，乘小船欲还仁营。”又如《后汉书·祢衡传》云：“令五百将出，……遂令杀之。”等等。

既然“伍伯”之名在史书中十分常见，那么“采诸国史”而写作《三国》的罗贯中断然不会犯下误作“伍伯”为“五百人”的错误，罗氏原稿一定同于叶逢春本，也就是说叶逢春本在这一点上保留了罗氏原稿的面貌。

关公之死。第153则《玉泉山关公显圣》中嘉靖本和叶逢春本关于关公之死的描写很不一样。叶逢春本详细描写关公父子被擒被杀的细节（共约500字，参见叶本卷7《玉泉山关公显圣》），嘉靖本则只简单写道：

公与潘璋部将马忠相遇，忽闻空中有人叫曰：“云长久住下方也，兹玉帝有诏，勿与凡夫较胜负矣。”关公闻言顿悟，遂不恋战，弃却刀马，父子归神。 739页（页码从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下同）

嘉靖本显然在写关公之死时有避讳^⑨，说明嘉靖本曾经经过了梓行者的修饰改写，而叶逢春本客观描写关公之死，说明它在此处保留了罗氏原稿的面貌。

张苞之死。第197则《孔明智败司马懿》写张苞追赶魏兵，不慎连人带马跌入涧中，将头跌破。嘉本随后只写“孔明令人送回成都养病”。直到下一则《仲达兴兵寇汉中》才提及张苞之死：“忽报有人自成都而来，说张苞破伤风身故，敕葬于锦屏山。”并在该句后有小注：“后主后封苞弟张绍为侍中。”而叶本在同一则写孔明送张苞养病后续写张苞“患破伤风身死，敕葬于成都，后主封张苞弟张昭为侍中郎将。”

三

嘉靖本和叶逢春本这两个版本的差异还表现在遣词的不同和串句脱文的差异。首先，嘉靖本和叶逢春本在遣词上有俗与雅的区别，下面的对比可以明显看出，叶逢春本的用词比较粗朴，而嘉靖本的用词则相对雅驯，比如：

鼓噪（操鼓）；市井（街市）；每年（递年）；敢勇（英雄）；沙汰（同谋）；筛酒（酹酒）；黎民（黎庶）；马瘦（马羸）；规模（模样）；接引（勾引）；冒突（冒渎）（后面括弧内是嘉靖本的用词）：

其次，叶逢春本的词语多用谐音，故出现很多谐音致误的情况，这其中又以人名谐音最为普遍。比如嘉靖本中张飞字“益德”，与《三国志·蜀书·张飞传》的记载：“张飞，字益德，涿郡人也”相同，而叶逢春本则把张飞表字写作“翼德”。其他叶逢

春本人名因谐音致误的有：“均郎”误作“君朗”；“唐州”误作“唐周”；“桥玄”误作“乔玄”；“严政”误作“严整”；“张资”误作“张咨”等等。除了人名之外，叶逢春本因谐音致误的还有“清早”写作“侵早”、“仪表”写作“一表”、“四散”写作“士散”、“对圆”写作“对完”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叶逢春本的谐音的情况往往与《三国志平话》或元明三国戏曲一样，而嘉靖本则更符合正史的记载，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叶本保留了更多《演义》初创时期的语言特征，而嘉本则经过了刊行者的润改，文辞更加规范而贴近史实了。

嘉靖本和叶逢春本串句脱文比较。对于刊行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嘉靖本和叶逢春本《三国演义》版本而言，互有脱文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有的地方嘉靖本脱文而叶逢春本不脱文，有的地方叶逢春本脱文而嘉靖本不脱文，单凭简单的是否脱文还不足以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如果运用“串句脱文”的例子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说明嘉靖本和叶逢春本之间的关系。

第一、嘉靖本脱文而叶逢春本不脱文

上文已经列举了两个嘉靖本脱文而叶逢春本不脱文的例子，但是嘉靖本脱文而叶逢春本却不脱文的远不止这几处，通过比勘嘉、叶两本，我们又找到了三十余处嘉靖本脱文而叶逢春本却不脱文的例子，本文限于篇幅，仅举以下两例：

例 第131则《关云长单刀赴会》

不脱文 权召诸葛瑾入说其计，瑾曰：“无功报主，万死不辞。”遂命将诸葛瑾老小虚监在官府，即时修书，发送诸葛瑾往西川进发。叶6：39

脱文 权召诸葛瑾老小虚监在府，先使人报知。孙权即修书，打发诸葛瑾望西川进发。嘉632页

例 第134则《张辽大战逍遥津》

召籍入，升堂再拜。权曰：“劳事无道之主乎？”伊籍应

声答曰：“一拜一起，未足为劳。”权愕然。良久问曰：“汝到此何为？” 叶 6：51

籍见孙权，升堂拜毕，权问曰：“汝到此何为？” 嘉 647 页

第二、叶逢春本脱文而嘉靖本不脱文

叶逢春本有串句脱文而嘉靖本却不脱文的例子也有许多，比如第 90 则《群英会瑜智蒋干》中嘉靖本中有一段对话：

军士曰：“先生那里去？”干曰：“吾在此恐误都督事，权且告别。”军士亦不阻当。干下船，飞奔将北岸，来见曹操。操问：“先生干事若何？”干曰：“周瑜心如铁石，不可说也。”操怒曰：“事又不济，反被东吴之笑。” 嘉 447—448 页

而到了叶逢春本中，上述对话简化成为：

军士问：“先生那里去？”干曰：“吾在此恐误了都督，事不得济，反被东吴耻笑。” 叶 4：67

叶本显然漏掉了两个“事”字中间的蒋干回见曹操，曹操与蒋干的问答等内容。叶本脱文而嘉靖本不脱文的例子远不止此一例，类似例子尚有四十余处，我们列举如下两例：

例 第 102 则《诸葛亮一气周瑜》

不脱文 曹兵冲来，众将向前抵住，混战一场，救起周瑜，回到帐中。程普问曰：“都督贵体如何？”瑜密与普曰：“此吾之计也。”普曰：“计将安在？”瑜曰：“吾身体苦无痛楚，欲令曹兵说我病危，必欺敌也……” 嘉 595—496 页

脱文 曹兵赶过来时，众将向前抵住，混战一场，救周瑜，回寨到帐中。曰：“吾身中苦无痛处，欲令曹兵见我病危，必欺敌也……” 叶 5：21

例 第 103 则《诸葛亮傍掠四郡》

不脱文 周瑜犹自忿气未消，忽报吴侯遣使至，瑜令请入，使曰：“吴侯围合肥，累战不捷，密令都督尽收军回。”嘉

499 页；

脱文 周瑜只是忿气未息，忽报吴侯见围合肥，累战未捷，急令都督尽收军回。 叶5：24

在嘉靖本有大量串句脱文的地方叶逢春本却不脱文，这说明叶逢春本必然不出于嘉靖本；而在叶逢春本有大量串句脱文的地方嘉靖本也不脱文，又说明嘉靖本也必然不出于叶逢春本，也就是说今存刊行时间最早的两种版本之间是没有从属关系的，于是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嘉靖本和叶逢春本是罗贯中《演义》原稿衍生出来的两个并行抄本系统的早期刊行本，两本在长期的传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互不相同的串句脱文，也各自保留了罗氏原稿在内容和文辞上的部分面貌。

嘉靖本中出现为数很多的串句脱文，起码说明《三国演义》付梓之前经过了多年的传抄，嘉靖序刊本之前有多种抄本自不待言；而且有迹象表明，在嘉靖本梓行之前似乎有过别的刻本存在。

上海残页。上海图书馆藏有《三国演义》版本的一个残页，该残页是嘉靖周显宗刻本《陶渊明集》两册前后的衬页。据沈津先生考证，这个残页虽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纸张、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甚至可能早于嘉靖本。^⑮残页的行款为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二字，与嘉靖本行款（半叶九行，行十七字）大有区别。

残页是第29则《孙策大战太史慈》的一部分（缺文据嘉靖本补）：

“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拍马赶去。众将皆笑（嘉靖本作“众皆大笑”）。却说孙策看了半晌，……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二从人（嘉靖本作“十三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又诈败走，……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

残页文字与嘉靖本无大异，但有两处嘉靖本的文字不同于残页：一、残页作“众将皆笑”，而嘉靖本作“众皆大笑”；二、残页作“十二从人”，而嘉靖本作“十三从人”。显然残页不是嘉靖本。值得注意的是，别的明刊本在这两处都从残页文字，也就是说只有嘉靖本在这两处不同于别的版本（惟一在此处同嘉靖本的是据嘉靖本翻译的满译本），可见是嘉靖本在刻印时把原文弄错了，所以残页所据底本也不大可能是嘉靖本。

书目记载。与嘉靖本同属一个版本系统的有明人记载的以下四种本子：

第一、二百四卷本《三国志通俗演义》 明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史部野史类著录：“《三国志通俗演义》二百四卷；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明罗本贯中编次。”按：“二百四卷”似为“二十四卷”之误。高儒《百川书志》的自序写于嘉靖十九年（1540），可知它著录的《演义》的刊刻时间应在此之前。

《三国》明刊本的题署一般有两句，首句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各本基本相同，第二句则颇多歧异，但在今存十几种有明确题署的明刊本中，没有一种题“明罗本贯中编次”的。《百川书志》成书只比嘉靖本的刊行晚十几年的时间，它著录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不像是嘉靖本，因为嘉靖本是刻印精美的珍本，如果高儒记载的是嘉靖本，所距时间又如此接近，他是不会弄错嘉靖本的题署的。

而高儒记载的这个题署“明罗本贯中编次”的本子的书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说明它又是一个“演义”系列的本子，它至少刊刻于嘉靖十九年（1540）以前，那么它的刊行时间会不会早于嘉靖本呢？看起来很有可能，因为如果它的刊刻时间晚于嘉靖本，那么其题署应与嘉靖本大致相同，而这个本子的题署独与别本不同，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其刊刻时间当不会晚于嘉靖本。

第二、武定本《三国（志）通俗演义》 明晁瑳〔嘉靖二十

年（1541）进士〕《宝文堂书目》子杂类著录。

有学者认为“现存的嘉靖壬午（元年）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应当就是《宝文堂书目》所说的‘武定板’”。其申述的理由虽有一定道理，但显然还不足以证明“武定本”就是嘉靖本^⑭。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之前，暂且存疑。

第三、经厂本《三国志通俗演义》 明宦官刘若愚《酌中志》^⑮〔成书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左右〕卷十八《内板经书纪略》著录：“《三国志通俗演义》廿四本，一千一百五十页”，此为原藏内廷经厂库内的司礼监刻本。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断它为“嘉靖刻”本，但经厂本绝非现存嘉靖本，因为嘉靖本共有一千九百二十三页，而经厂本才一千一百五十页。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页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⑯

第四、都察院本《三国志演义》 明周弘祖〔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古今书刻》著录《三国志演义》。因著录太简，我们无从知晓这个本子与嘉靖本有何关系。

上述四种版本都刊刻于嘉靖前后，因此不断有学者试图证明它们就是嘉靖本。郑振铎先生怀疑《百川书志》和都察院刻的《三国志演义》“大约即为嘉靖本”；竺青、李永祜认为“武定本”即是嘉靖本。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除《古今书刻》著录本以及“武定本”和嘉靖本的关系尚待查考外，《百川书志》著录本和经厂本（包括上海残页所出的版本）当不是今存嘉靖本，而且种种迹象表明，这三种版本的刊行时间都有可能早于嘉靖本。

通过比较嘉靖本和叶逢春本这两个版本的异同，我们可以大致推求前嘉靖本时代《三国演义》版本流变的情形：罗贯中在元末明初写成《演义》的初稿，由于朝代更迭之际的动荡不安的历史条件所限，《演义》成书以后很长时间没能刊行，但是由于其杰出的艺术成就，它很快便在文人圈内广泛流传，“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誉录”，因此《演义》版本的最早流传是以抄本的形

式，而且当时的情形一定十分热闹，抄本的种类也会很多，可惜那时距今毕竟时间久远了些，因此没有一个抄本流传至今。今天的研究者只能从早期的两大刻本——嘉靖本和叶逢春本中去探求罗贯中原稿的面貌了。

前嘉靖本时期广为流传的不同的抄本经过了各自长期的流变，到了明代中叶，出现了由不同抄本系统演化而成的《三国演义》的刻本，其代表就是嘉靖本和叶逢春本。

嘉靖本刊行于嘉靖元年（1522），虽然它是现存刊刻年代最早的刻本，但我怀疑在它之前曾经有过刻本存在。叶逢春本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比嘉靖本的刊行晚了二十多年，但它并不以嘉靖本为底本，也就是说，它并不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只是嘉靖本的简单翻版。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乃至具体的文辞上来比较，嘉靖本和叶逢春本二者之间都存在很大的区别。我们正是通过详细比勘嘉靖本和叶逢春本这两个刊行时间最早但又有着明显差异的版本，初步勾勒出罗贯中所写的《三国演义》原稿的面貌。

嘉靖本刊行时对版本的形式作了较大的调整（当然也不排除是嘉靖本传抄过程中有人作了调整的可能性），而叶逢春本则更多保留了原稿的面貌，罗贯中原稿在分卷、年代记录、卷前的总歌和人物表方面与叶逢春本相近，嘉靖本（或其祖本）刊行时对抄本形式作了大的改订，把正文分为二十四卷；去掉原稿卷首的总歌而代之以自撰的类似总歌的“俚语”；根据史书增入大量的论、赞、评；增入并改写了原稿的许多注释等等。

在内容上，嘉靖本和叶逢春本都有许多共同的小字注，因此罗氏原稿中也有异于正文的注释；嘉靖本和叶逢春本都完全没有（花）关索的故事，因而罗氏原稿也没有该（花）关索的故事；有些只分别见于对方的内容也是罗氏原稿没有的，比如叶本中大量周静轩的咏史诗，嘉本中大量采自史书的《论》、《赞》、《评》等

等。

叶逢春本和嘉靖本都有许多不同的串句脱文的情况，即许多地方叶逢春本有串句脱文而嘉靖本不脱文，但在另外许多地方，嘉靖本有串句脱文而叶逢春本却没有串句脱文，两本在串句脱文方面的巨大差异进一步证实：叶逢春本和嘉靖本是罗氏《演义》原稿按照不同抄本系统发展的结果，两本之间并没有从属的关系。

明代中后期是《三国演义》版本演化的黄金时期。嘉靖本和叶逢春本两种版本沿着各自的线索发展，产生了数量众多的版本。以嘉靖本为底本的一组版本演化成一类版本，以叶逢春本为底本的一组版本演化成另一类版本。至于《三国演义》版本在明代中后期演化的具体情形将留待以后的文章再行探讨。

注：

①郑振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载《中国文学研究》，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166—239页。

②周兆新：《三国演义考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③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④当然，也不排除极个别串句脱文的情况是由于抄手或梓行者故意删减而造成。

⑤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

⑥这说明《三国演义》早期的抄本中没有该故事，因为从串句脱文的情况来看，嘉靖本和叶逢春本之间没有继承关系（详见下文），而（花）关索故事不可能同时被这两种版本系统的祖本删掉，所以罗贯中的原稿中也没有（花）关索的故事。至于（花）关索故事的来源，笔者将另有专文论述，此不赘。

⑦刘修业：《古典小说戏曲丛考》，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66页。

⑧其中陈寿《评》九条，孙盛《评》三条，其他引自《东汉详节》的《论》、《赞》十四条。

⑨《十七史详节》，宋·吕祖谦编，是广泛流传于南宋和元明时期的《史

记》等十七部史书的节编本。

⑩《瓦口张飞战张郃》叶本第一次出现音注，“巖渠”之“巖”后注：“音荡”；《诸葛亮六擒孟获》叶本出现第二例音注，“洸州”后小注：“洸音回”。嘉本作伪州，无音注。

⑪值得注意的是，被一些论者作为证明《演义》成书年代重要论据的一条嘉靖本小字注，即“桂阳”后注“今属郴州，尚有桂阳路之名”，恰恰在叶本中既没有这条小字注，也没有类似正文，而其他三条小字注都同嘉靖本。

⑫嘉靖本有初刻本和覆刻本。初刻本与叶逢春本一样描写关羽之死时不避讳，覆刻本避讳。

⑬沈津：《〈楚辞〉及汉魏六朝别集》，载《文献》1990第2期。

⑭竺青、李永祜：《〈水浒传〉祖本及“郭武定本”问题新议》，载《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

⑮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⑯详见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